

与群众牵手连心 让文化走进万家

新华社记者 郑 昕

『红色娘子军』能舞会武

中央芭蕾舞团赴贵州、海南慰问演出侧记

本报记者 胡芳 李萌

1月6日至12日,中央芭蕾舞团赴贵州、海南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把《红色娘子军》、《堂·吉珂德》、《天鹅湖》等经典芭蕾选段以及交响乐经典《拉德斯基进行曲》等带给基层观众。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安顺“喜迎新春、众享音乐”中央芭蕾舞团“三下乡”慰问演出1月6日、7日分别在贵州省安顺市文化活动和中心和普定县工人文化宫举行,两场演出的门票均免费发放。

在安顺文化活动中心的首场演出中,可容纳700余人的剧场临时添加了数十把椅子。来自安顺市第九小学合唱班的学生们跟记者分享了他们的感受:“演员的衣服很漂亮,跳舞的时候像在飞。”“有两首曲子我在电视上听过,刚才还跟着节奏拍手呢。”观众席后方的一片迷彩服引起记者的注意,是来自西秀区人武部的陈参谋带着部分民兵来到现场观看演出。“之前看的慰问演出小品、歌曲居多,芭蕾舞还是第一次看。”陈参谋说。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芭蕾舞团在正式演出前还专程到安顺市福利院进行了慰问演出。“我刚到福利院5个月,这是我到这里以后第一次看演出。特别高兴!”安顺市福利院的金玉书老人说。

在中央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张剑看来,观众的期待与热情是她演出最大的动力。张剑出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序曲和《卡门双人舞》两个节目,尽管患了重感冒,她依然坚持将节目完成。“赴场演出对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但是能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芭蕾,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张剑说,“不要求每位观众都能看懂,只要喜欢就可以了。”

结束在安顺的演出,1月8日,中芭小分队奔赴“娘子军连”的故乡海南与大队

会合,以120余人的阵容在海口市、琼海市、三沙市、三亚市进行了4天6场的公益慰问演出,也开启了“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5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

在游人如织的海口万绿园,中芭献上了海南站的首场演出。两位来自重庆的游客说,他们平时就在老年大学跳舞,一个跳民族舞,一个跳拉丁舞,近距离地看这么高水平的舞蹈还是第一次。来自甘肃的张月英表示,演出勾起了她几十年前的记忆。“《红色娘子军》我从小就

就会跳,小时候在宣传队常跳这个舞,现在给我道具就能摆娘子军的姿势。”张月英说。

武汉游客邱桂金带着外孙女看完了演出。“我们当时为看电影《红色娘子军》,跑了十几个剧场,看了好多遍。”他被演出勾起了难忘的军旅情怀,“这种演出对我们下一代人的党史、军史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从河北承德兴隆县半壁山镇来海南自助游的程玉英和白俊春夫妇,提前几天得知中芭演出的消息,特意改签了回程机票。“机会太难得了,在我们那儿只有电影下乡,平时看这种演出只能在电视上,很少能看到现场的。”

为了更好地呈现新一代芭蕾“娘子军”的风采,中芭团长冯英每场排练都亲自指点动作要领。“年轻演员因为距离那个年代比较远,除了在动作力度上要不断揣摩外,还要认真领会女兵的气质,在神态上要有娘子军的自信。当时的娘子军骨子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坚定和倔强。年轻演员要多学习相关史料,多看老一辈演员的演出,不断学习摸索,借鉴提高。”冯英说。

万绿园的演出结束后,中芭还在海南省歌舞剧院、琼海市万泉河喷泉广场、三沙永兴岛、三亚榆林海军礼堂献上了5场演出。

面向群众的舞台天地广阔

1月14日,午后的延安虽然阳光明媚,温度却只有零摄氏度。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场上的千余名群众,被舞台上的真情表演深深打动,那些以往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表演艺术家,如今把舞台搬到了群众家门口。“真想不到,冯巩、股秀梅这些著名演员,今天竟然离我只有十几米。”退休工人老周说。

尽管这场在延安的慰问演出有不少群众耳熟能详的“明星”,会场布置却十分节俭,一辆卡车侧面贴上海报就成了背景板,舞台也只是距离观众席三四米的一处小高台,背靠着宏伟的延安革命纪念馆。

在广播艺术团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的文艺小分队演出时,在曾经召开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小院里,演员们和观众的距离更是伸手可及。当冯巩的小品开演时,已经站在了观众脚前,忙得工作人员几次把道具含着距离观众更近的地方移动。

“虽然这次演出没有豪华的舞台、绚丽的灯光,但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广场,面向的是基层群众,是艺术家们大有可为的空间,而我们头顶的红太阳,则是最美丽的灯光。”中国广播艺术团党委书记、副团长江平说,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可爱的观众,“那么冷的天,我们每人在台上也许演十几分钟,可观众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因此与其说我们是来慰问延安的百姓,不如说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不仅是在延安,中国广播艺术团13日在西安的演出,同样贯彻了节俭办演出的新风尚。尽管陕西的承办单位曾建议本次演出“进剧院”“办晚会”,但艺术团坚持不用地方一分钱,因地制宜地

创造出节俭但同样气势恢弘的舞台。把演出安排在下午气温较高的时段,不仅让老百姓在室外不受冻,也省去了夜间灯光、舞美等开销。

在当天的演出中,中国广播艺术团把舞台搬到了国家4A级景区西安大唐西市的金市广场上,背靠着大唐西市的仿古建筑和电子大屏幕,只搭建起一座小小的舞台,便制造出一种贯通古今的“穿越”效果。

“这次来陕西,中国广播艺术团无论从节目编排和艺术家选择上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冯巩说,“这次演出是我们宣传中国梦精神、落实文化走进万家活动的一个重要举措,陕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很多值得我们汲取的营养,今后用在我们的艺术创作中。”

艺术家梦想中的作品 取决于老百姓是否认可

尽管当下的艺术家并不缺乏走进基层的机会,但如何真诚地融入老百姓之中?中国广播艺术团用自身行动给出了答案。最好的方法就是放低身段,把好节目带下来,让观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最好的作品。

在当天的表演中,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在台上奉献着人们喜闻乐见的歌舞、小品,在台下也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这边有小孩子站在刘全和、刘全利两兄弟之间合影,那边有年轻人和冯巩聊他将在马年春节晚会的节目,文艺工作者和老百姓们在这里亲密无间,交流着对文化的理解。

“当代的文艺工作者需要重新认识‘为了谁’和‘我是谁’的问题。我们不是明星大腕,而是肩上有使命、心中装着群众的人民文艺工作者,这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心声。”江平说。

中国广播艺术团成立60多年来,就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团长冯巩则是这种紧扣时代脉搏、用艺术服务人民的代表之一。他率领弟子为延安人民奉献的相声《为您放歌》,不仅把现场乐队表演融入到相声这门语言艺术中,实现了形式的创新,同时节目蕴含的支援西部的主题和积极向上的风格也与延安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谋而合。

在谈到文艺工作者的梦想时,冯巩说要得到群众的认同,就需要经常拿出反映群众心声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来展现自己的艺术风采,老百姓才能

认同你、承认你。我们赶上好时代了,赶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

正如冯巩所说,正是有了这个前提,艺术家们才有条件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欢乐,才有可能到更多的地方去体验、去捕捉生活当中鲜活的素材,最后升华成为艺术作品。如果说艺术工作者是一滴水,那么只有投入到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中去,这一滴水才能够存在,才能被群众认可。

“文艺作品作为弘扬时代精神的旗帜,就是要更好地激发起人民群众的积极的工作情绪,为实现中国梦共同努力奋斗。”江平总结说,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取决于票房、上座率,而是有多少观众真正领悟到作品的实质,能不能给人以启迪,能不能给人以力量。

陕西“文化进万家”好戏还在后头

尽管中国广播艺术团只在陕西演出了两天,但三秦大地在马年春节并不会缺少优秀的文艺演出与文化活动。记者从陕西省委宣传部获悉,2014年春节期间,陕西省将配合中央关于“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的号召,在全省范围开展文艺工作者进社区、进工厂、进乡村的文化公益演出活动。

春节期间,陕西省文化系统举办各类春节文化活动,活动范围辐射至省内各市、县、区及部分乡镇,活动形式包含戏曲、音乐、歌舞、书画、摄影、电影放映、诗歌朗诵、主题阅读、饮食文化、民间工艺展示、民俗活动、非遗展示等近30类的600多项活动。

这其中,既有在影院、剧场举行的文化惠民演出,如秦腔、话剧等,也有艺术家走上街头、走进社区为群众送春联、送祝福的活动。由陕西省文联举办的“我们的中国梦·好歌唱三秦”送欢乐下基层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已经于1月2日、3日在陕西省富平县完成了两场演出,春节前后还将在陕西省内进行惠民演出20余场。春节前夕开展的“送温暖下基层”慰问民间艺术传承人活动,会向陕西省内的民俗艺人送去慰问,把富有中国特色和陕西特色的民间文艺继续传承、发扬。

同时,陕西也利用文化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科技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通过开展民俗展览、书法笔会与指导、雕塑艺术讲座等方式,为群众提供文化服务,让老百姓在即将到来的马年充实精神生活,把对文艺的喜爱融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中。(新华社延安1月15日电)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中国节日志”丛书的编纂故事

本报记者 边思玮

音乐家周巍峙回忆起小时候跟着祖父听说书,逢年过节追着耍龙灯和舞狮子的队伍到处跑的情景,眼睛里流露出的神采让人忘记了公司已98岁高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之后,他又一次站在收集整理中国传统节日的前台,担任“中国节日志”丛书的主编。

这一由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牵头编纂的传统节日丛书,近日在北京发布了首批10卷。到2016年,涵盖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传统节日、庆典、祭会的“中国节日志”,将出版和发布200卷图书、百部节日影像纪录片以及“中国节日文化数据库”。

数千名专家学者参与的“中国节日志”项目,所承载和反映的远远多于这些成果。

这本来是一条宽阔的大河,但后来成了涓涓细流

2009年,400册、4.5亿字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这套丛书被誉为“民族文化的大百科全书”。“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耗时30年,调动了全国数十万文艺工作者,将中国民间文艺的各个项目掰开、揉碎记录下来,成就了民族文化的“万里长城”。

在“文艺集成”项目进行的后期,研究人员发现,传统文艺和习俗正在逐渐消失。“本来我们以为是‘文革’的破坏,后来才发现,现代生活方式才是造成传统丢失的主要原因。”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说,中国的民间文艺本来是一条宽阔的大河,但随着项目的推进,才发现这条河变成了涓涓细流,甚至即将断流。

由于节日所涵盖的丰富民族民间文化,以及保护和抢救的迫不及待,2005年起,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开始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切入节日研究。2009年,“中国节日志”项目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并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牵头编纂“文艺集成”的李松成为“中国节日志”项目的负责人。在他看来,“节日志”就是“文艺集成”的延伸。

“文艺集成以单个艺术形式编纂,但老百姓的日子并不是按照学术或艺术分类来过的。”李松认为,节日是老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能促成社区生活的联动。若以节日做志书,不仅能全面展现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状态,也可以将“文艺集成”里细分、切碎的文艺形式重新捏合成整体。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张跃是“中国节日志”编纂团队的负责人之一。在对怒族节日“仙女节”和“如密期”的调查记录中,他经历过两场令人唏嘘的告别。2009年,云南省怒江市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乡日当村81岁的长老施文兴为项目组讲述了“仙女节”起源。

当项目组2012年再去采访时,他已经去世了。“如密期”节日调研中,负责制作演奏“达比亚”(怒族的一种乐器)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拉萨,也在接受采访的第二年离世。“随着文化精英的离去,那些关于节日的记忆也一同远去了。”张跃说。

“为国家做事儿,这事儿有学术水准,你愿不愿意好好做”

从2009年起,“中国节日志”开始整合民族学界、民俗学界和人类学界的优势力量,吸纳超过2000名相关专业

的硕博研究生以及100多位教授承担了“中国节日志”的130多个子项目,首批启动的20多个中国节日影像志项目也吸引了上千人参与。

“在项目立项上没有障碍,在知识产权管理、经费使用上也没障碍,但在学术上却困难重重。”李松如此评价“中国节日志”项目。从2005年起,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开始试编纂“中国节日志”。尽管有编纂“文艺集成”的经验,但如何在完整记录当地节日的同时,以标准化的方式成文,并形成志书的体例,让大家犯了难。

“不同领域的专家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也有不同的记录方法。”李松说,“在试编纂时,每个专家都给出了很好的东西,但就是捏合不到一起。一年纠结,再去第二年,还有缺陷。把这些弯路走完了4年时间。”为了形成统一的志书体例,使得丛书更具学术水平,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和项目组专家开了无数次会。与项目直接相关、同时进行的中国节日影像志项目,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大部分节日都有较长的周期,错过一次就得等至少一年。比如,贵州的鼓鼓节,影像组一拍就是3年。

“咱是为国家做事儿,这事儿有学术水准,你愿不愿意好好做?”李松在一次项目会议上说。这项集全国之力的民间文艺项目,最终确定了以传统志书和田野调查为主体的呈现方式。

尽管中国历来有修志传统,但“中国节日志”项目将修志的领域延伸到民间文艺,其意义非同凡响。同时,项目采用了源自于西方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希望节日研究能够适用于现代西方的经典理论,以体现学术的发展方向。

“咱们的生命搭在里面,不能忽悠,别干完了经不住回头看”

按计划,“中国节日志”丛书第一批可以出版到十六七卷,但临到出版,很多项目组退出了今年1月的出版计划。“一些专家觉得做得不够好,想再跟



走入深山调查鼓鼓节的队伍

着过一次节。”丛书出版方、光明日报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说。

对大多数项目组来说,“跟着过一次节”意味着从节日前10天就要赶赴当地调查采访,直到节日结束后数天。“晚上睡觉常常在当地中小学的课桌上,有时还自带帐篷睡觉睡在户外。”丛书编辑部副主任王学文说。

与这些辛苦相比,张跃的调研经历则更为惊心动魄。由于怒江大峡谷山势险峻难行,盛行“仙女节”的丙中洛乡又处在峡谷深处,他的项目组曾两次遇到车祸。还有一次,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前边的中巴车侧翻入怒江,卷走了20多名乘客。

“正是因为与世隔绝,所以那里的民俗才能保留得那么纯粹。”张跃说,冒着生命危险从事了两三年的调查研究,他对民族节日的变化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的介入,虽然节日的核心保存了,但是新的现代文化元素也越来越多,甚至街舞、流行歌曲也成了节日表演的一部分。”张跃提到,“流动人口的进入,以及受电视媒体的影响,年轻人都开始追求时尚,只有老年人还在坚持过传统节日。”

令张跃遗憾的是,尽管节日志本身试图全面地展现当地节日,但对只有10个人的项目组来说,观察和采访都比较有限。“我们不能花10年去完成一个节日的记录,那样传统节日会产生很大变化,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张跃说。

张跃只是130多个子项目组负责人中的普通一员,他和其他项目组一样,并没有太多的科研基金支持,但他们对调查和报告撰写要求几近苛刻。

支持他们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国家项目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我们举国之力做传统文化记录,这是很有文化气派的事儿。”李松说,“咱们的生命搭在里面,不能忽悠,别干完了经不住回头看。”

“节日志通过对不同民族节日的记录,可以让政府相关部门更懂老百姓”

周巍峙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再强调,传统节日不仅具有凝聚人心、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传播社会主流价值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保护、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对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意义深远。

1月8日试播的影像纪录片《献牲》里,展现了居住帕米尔高原柯尔克孜族人过“古尔邦节”的情景。影片中,现代化的脚步跟着载重卡车开进了村庄,传统的生活在纠结。宗教信仰、传统习俗、人们的心态都发生了改变。纪录片拍摄者说,影片展现了柯尔克孜族人的当下心态,他们希望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节日志通过对不同民族节日的记录,可以让政府相关部门更懂老百姓,提供更适合的文化服务。”李松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节日的序列周而复始,人与自然的和谐借助节日达到了巧妙的作息平衡。“节日可以调整社区、行业、家庭、宗教、社会关系。”李松认为,“节日使得生活有节奏、有美感。”通过文化活动,人与人的和谐在节日中实现,和谐社会的状态也将逐步形成。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李松说。



近距离拍摄姊妹节